

一棵古槐，树干已经空朽了，枝叶依然茂盛，葱葱茏茏像把大伞，半遮半掩着一个杂货铺——公私合营第四门市部。

这个门市部由两人经营着，一个是我父亲，一个是钱掌柜。钱掌柜是组长，我父亲是组员，一官一兵。

钱掌柜比我父亲大三岁，看上去却比父亲年轻得多，精神得多；一头黑发两只笑眼，肥头大耳满脸光气。公私合营前，他在十字街上开一小铺，名叫“荣盛源”，买卖越做越小，但他一点也不着急。黑夜上了板打，小铺里照例飞出一台戏：“我说苏三走动啊！”“苦哇！”“仓台七台仓台七台仓仓——”“喂呀！忽听得唤苏三的魂飞魄散，吓得我战兢兢不敢向前……”又是丑又是旦，又是哭又是笑，又有京胡伴奏，又有口念的锣鼓点儿，唱到精彩处，“好！”——还会爆发叫好的声音。站在门外乍一听，不知屋里有多少人，其实就他自己。

公私合营后，他仍然爱唱，门市后面的小屋里经常挂着一把京胡。一天晚上，他正唱得热闹，零售经理部的李书记来了。李书记说：“老钱，怎么啦，这么高兴？”他哈哈一笑，嘴里竟然冒出一句妙语：“有人说工商业者黑夜哭白天笑，那得看谁李书记，我老钱可是自拉自唱着进入社会主义的！”李书记听了，十分欢喜——他当门市组长，大概就是得益于这句妙语。

但是，他这个门市组长，很少在门市上待。他一上任就说：“老贾，我这个人大浪荡，坐不住，重活我干，责任我负，守门市靠你啦。”于是，他们这里不是组长指挥组员，而是组员指挥组长。组员说没醋了，他便拉上小车儿去拉醋；组员说没点心了，他便去拉点心——早晨出去中午回来，中午出去晚上回来，一走就是半天。有时组员也批评他两句，他总是哈哈一笑说：“我这个嘴好呱呱，熟人又多，碰见谁不得呱呱几句？”——“好呱呱”，就是好说话。

有一天，他去拉醋，早晨出去，次日中午才回来，弄得组员哭不是笑不是：

“老钱老钱，我把你丢了呢！”

“丢了，昨天黑夜我到石家庄去了一趟。”

“拉醋用到石家庄？”

“尚小云来了，我看尚小云。”说着，拿起鸡毛掸子，扭动胖大腰身，学起尚小云来。

钱掌柜平时浪漫，到了关键时刻，真干。

钱掌柜果然犯了错误。反右派的时候，虽然没有戴上帽子，但被狠狠“挂”了一下，遭到了辩论。他的主要错误是丑化党的领导，具体言论是：“你看咱们李书记，上身长下身短，穿上什么衣服也不顺眼。”——他是“不合体”，群众揭发是“不顺眼”，辩论了好几个回合，他才抱头痛哭，承认是“不顺眼”——果然是吃了“好呱呱”的亏！

钱掌柜犯了错误，不再“呱呱”了，但是依然爱唱——胡琴筒里塞块毛巾，小声唱。一天父亲中了暑，让我去请假，他正坐在柜台后面眯着眼睛哼哼着唱哩。他说他用旧曲调，编了新唱词儿，全是歌颂大跃进的；又说国家提出了“超英赶美”的口号，他也不能落后，他要赶超尚小云……

“老钱，不忙啊！”

他正向我讲解怎样赶超尚小云，一个又黑又瘦的中年人走进来，行唐口音。他赶紧打整精神，笑脸相迎：

“哎呀，李书记，你真稀罕！”

原来在我想象中，李书记是一个非常严肃、非常厉害的人。其实，他很随和，也很朴素，穿一件肥大的圆领背心，拿一把破旧的芭蕉扇子，像个卖西瓜的；钱掌柜虽然犯了错误，但是他的眼光里，没有一点冷漠和歧视。他看了看货架上的货物，摇着芭蕉扇子说：

“老钱，最近县里要开全面跃进誓师大会，你对咱们公司的跃进规划有什么意见，提提吧！”

李书记是来征求意见的，跃进指标如何，具体措施怎样，群众有什么反映，都问到了。不管他问什么，钱掌柜总是笑呵呵地说：“挺好。”

“对我个人有什么意见也可以提一提。”李书记又说，“比如，思想方面的，干劲方面的，工作作风方面的，都可以提——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反对右倾保守和本位主义思想，扫

钱掌柜

□贾大山

贾大山(1942.9.9—1997.2.20)，河北省正定县人，1964年作为下乡知青到正定县西慈亭村插队务农，后调至正定县文化馆。历任正定县文化局局长、县政协副主席，河北省政协常委、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《人民文学》《北京文学》《河北文学》《上海文学》等多家刊物发表小说。《取经》获1978年全国首届优秀短篇小说奖。《花市》《村戏》获河北优秀小说奖。《大姐》获河北文艺振兴奖。《中秋节》在《河北文学》发表后，被《中国导报》译载。《赵三勤》收入日本银河书房出版的《中国农村百景》，并获《山西文学》1980年优秀小说奖。其作品多次被《小说选刊》《小说月报》《新华文摘》等选刊转载，并收入各种选本。《贾大山小说精选集》即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。

清跃进的障碍！”

李书记的扇子向前一推，做了个扫清障碍的姿势，然后坐下了——看来一时半会儿走不了。钱掌柜拍着脑袋想了想，笑着说：

“那我就提一条！”

“提吧。”

“我也是听反映。”

“反映也行。”

“不一定对。”

“错了也没关系。”

“要说你李书记，哪一方面都好，就是太爱喝酒了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一喝就是一斤半！”

“我？”

“喝醉了就骂人——这是不是跃进的障碍？”

“别的呢？”

“没有了。”

李书记哈哈笑了，钱掌柜也哈哈笑了。两人哈哈笑了一阵，李书记走了，一边走还一边笑。

李书记走远了，钱掌柜指着他的背影对我说：

“小子，你看他是不是上身长下身短？”

“像。”我问，“他真能喝一斤半酒？”

“他有肝炎，滴酒不沾。”

“那你……”

“这叫技术。”他笑了笑，嘴巴对着我的耳朵说，“领导征求同意，不提不行，提对了更不行，瞎提没事儿——你看他乐了不是？”

那一次，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很不好。他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笑，好像不是原来的钱掌柜了！

那年秋天，大炼钢铁的熊熊烈火遍地燃烧起来的时候，父亲被调到焦化厂小卖部工作，我也上了中学。一晃两年，我和父亲都没见过钱掌柜，也听不到关于他的消息了。春节到了，他把年货预备得非常齐全，天天顶门市，不到天黑不关门；中秋节到了，他便拉上小车儿带上胡琴，下乡卖月饼，走一村唱一村：“八月十五月光明，老钱送货出了城，社会主义无限好，老钱的月饼甜得不行。”——十分招人喜爱，县里检查卫生了，



他便亲自收拾门市，打扫库房，看见一只苍蝇，举着苍蝇拍从屋里追到院里，从院里追到街里，直到消灭为止……于是，不到一年光景，四门市的墙壁上便挂了不少小红旗。每领一面小红旗，他便自己掏腰包，请我父亲吃一顿。他说这些成绩的取得，全是我父亲努力的结果，鼓励我父亲戒骄戒躁，再接再厉——真像一个领导干部似的。最难得的是，父亲跟他打了将近两年伙计，从来没有发生过错账短款之类的事情。父亲常说，跟老钱打伙计，身子虽然“拴”得慌，可心里踏实。

我也喜欢钱掌柜。每次看望父亲的时候，他见了我总是朝后一指，悄悄地说：“小子，到屋里等着去。”我刚走到屋里，他便跟进来了，塞给我一块槽子糕、一块“大八件”，让我“咪希咪希”。他这么做的时候，总是蹑手蹑脚，满脸贼笑，但是“贼”得可爱。

一天晚上，我问父亲什么是“咪希咪希”？父亲说那是一句日本话，就是吃的意思。我听了很惊奇：

“钱大伯会说日本话？”

“他跟一个日本人学了两句。”父亲说，日本人占领县城时，钱掌柜因为贩卖了两箱火柴，被抓到贾村据点，那是杀头的罪过。受审时，他见日本人屋里也挂着一把京胡，便说：“你们让我唱一段儿，再杀行不行？”日本人竟然答应了。他一拉一唱，日本人大喜，不但没杀他，还请他吃了一顿饭，跟他交了朋友。

“哎呀，那不变成汉奸了吗？”我问。

“别睡说，不是汉奸。”父亲板起脸说，钱掌柜不但不是汉奸，他还忍着羞辱，保护过一群中国孩子。有一天，那个日本人来到“荣盛源”，让他拉胡琴。一群孩子看见了，冲着日本人骂：“操你娘！”日本人不懂这句话，便问钱掌柜，那是什么意思？钱掌柜告诉他，那是祝你长寿。后来，那个日本人见了钱掌柜，总要彬彬有礼地说一声：“钱先生，操你娘。”钱掌柜只好点头微笑：“谢谢，谢谢。”——钱掌柜能是汉奸吗？

原来，我不相信真有其事，可是后来不断看到人们这样逗他：“钱掌柜，那年你给日本人唱了一段什么呀？”

“‘打渔杀家’，小口儿！”他津津乐道。

“日本人也会拉京胡？”

“唉，吱呀吱呀的，像推碾子！”

“你真会说日本话！”

每当这时，父亲便看他一眼，重重咳嗽一声。但他并不理

会，叽里咕噜来几句日本话，然后洋洋得意地说：

“怎么样？地道的东京味儿！”

于是，父亲开始埋怨他了，嫌他“嘴松”，嫌他不会小声说话，嫌他喜欢炫耀自己。他呢，嘻嘻哈哈，满不在乎，我行我素。一天，他又让我“咪希”，父亲急忙赶到屋里说：

“老钱！别让他吃了，犯错误！”

“犯错误不在吃东西。”他说。

“在什么？”父亲问。

“在说话。”他好像预感到了什么，沉下脸儿说，“老贾，你瞅着，我迟早得犯错误。”

“怎见得？”

“我这个嘴好呱呱。”

“既然晓得，就要注意。”

这一回，他认真地听着，不再嬉皮笑脸的了。

最后一次见到钱掌柜，是在那个饥饿的冬天。那是一个下雪天，我到焦化厂看望父亲，路过四门市，看见钱掌柜仍然在柜台后面坐着。他看见我，笑着向我招了招手，我走到柜台前面，把他嘴一伸，小声说：

“小子，怪饥不？”

“不饥。”我说。

“不饥是假的。”他看了看点心匣子，两个手指一撇，比了个“八”字，“8块钱一斤了，不能‘咪希’了。”

想起当年情景，我不禁笑了：

“钱大伯，如今还唱戏吗？”

“唱，就是进步不大。”他说，“咱们国家没有赶上英国，我也没有赶上尚小云。”说完也笑了。

钱掌柜老了，头发稀稀地白了一半，眉毛也开始变白了；他的脸色像干菜，“胖”得难看，牙齿也脱落了好几颗。他过去不吸烟，那天手里夹着个烟嘴儿，烟嘴儿上按着个烟头儿，吸一口咳嗽半天。我问：

“钱大伯，你不是不吸烟吗？”

“不吸不给烟票。”

“如今买烟也要票？”

“嘿，买什么不要票？”

“你不吸烟，何必要烟票呢？”

“不兴烟票不吸烟，兴了就得要，不要白不要。”

说着，把烟嘴儿放到嘴里，烟头儿朝天像个小高射炮。他刚吸了两口，两眼一怔，忽然站起来了：

“你听，又一个！”

一片哀哀的哭声，簇拥着一辆马车过来了，马车上拉着一口棺材。马车前面，一个孩子身穿重孝，扛着一个白幡，马车后面跟着死者的亲属。钱掌柜好像看清楚了什么，从点心匣里抓了两块饼干，傻了似的走到街门口上，肃然而立。一片纸钱飘飘摇摇落在他的肩上，他都没有察觉……

送葬的队伍过去了，我问：

“钱大伯，谁死了？”

他不说话，呆呆望着飘走的白幡，好像遥望自己的归宿。白幡看不见了，他才轻轻叫了一声“老李”，把两块饼干扔到街心里去……

“哪个老李？”我问。

“我们李书记……”

“他！”我也一惊，“那年整你，不就是他吗？”

他摇摇头，不让我再说下去。他说老李人不错，大家浮肿了，他也浮肿了；病重的时候，天天还到食堂打饭吃，买个馒头，照样拿细粮票……说着，他拼命吸了两口烟，烟头儿早已熄灭了。他一挥手，连烟嘴儿也扔了，我说：

“钱大伯，你的烟嘴儿……”

“不要它了，困难时候，凑什么热闹呢……”

他拍拍身上的雪花，擦擦眼泪，又到柜台后面坐着去了。

后来我下乡了，再也没有见过钱掌柜。我只听说，在那动乱的时候，他到食品公司开办的养猪场里喂了两年猪，挨了两年批斗，最后死在一个学习班里，罪名是“日本特务”。后来平反，又说他不是“日本特务”了。

“不多，还是叫我小丹吧。”他雅然一笑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你也别叫我顾老师了，叫我老顾或文白吧。”

顾文白的儒雅着实让我心动。因为他的儒雅与一般人不同，儒雅中透着一种特立独行的气质和闲云野鹤的洒脱。“既然如此，我就叫你文白哥吧。”我亲切地说。“也好，也好！”他和蔼地笑着说：“文白哥，”我好奇地问，“为什么要把工作室安排在寺院内呢，莫非你是有佛缘的人？”他微笑着：

“确实和佛缘有关。有一次，我在山里散步，不小心滑倒，掉进了水潭，爬上来时已如落汤鸡一般，当时正值深秋，我冻得直发抖，幸好被慈恩寺住持灵法师撞见，他请我到寺里换衣服。喝茶聊天时心下纳闷，莫非这出家人也喜欢文学？还真让我猜着了，20年前，灵法师在俗时是学中文的，曾经梦想成为作家，而且发表过短篇小说。出家后虽然潜心佛法，但闲暇时仍然喜欢读小说，尤其钟爱我的作品，得知我就是顾文白后，非要在寺里给我安排一间工作室。灵法师说，慈恩寺一直致力于艺术的推广，除了每周一次的讲经会，寺院也通过摄影、绘画等展览传播佛教文化。不过，与其他艺术家相比，他还是更喜欢文学，非常希望闲下来时身边能有一个随时和他谈文学的人，感情难却，我只好答应了。何况像慈恩寺这种几乎接近世外桃源的地方，我求之不得。你不知道，我这个人喜欢静，我最喜欢阿多尼斯的一句诗：‘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。’”

“《历史》就是在这里写成的吗？”我用羡慕的口吻问。“是的，在这里我不仅完成了我最重要的作品，而且还有一个更大的收获。”他不无得意地说。他立刻地问：“什么收获？”我好奇地问。“灵法师是功力深厚的古琴家，我拜他为师学会了古琴。刚才我弹奏的《高山流水》就是他最喜欢的曲子。”他如数家珍地说。

“正所谓高山流水觅知音，文白哥，你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吗？”我卖关子地说。“当然可以，能回答美女画家朱小丹的问题，是我的荣幸！”他用开玩笑的语气说。“我在你的书中看到了你的画，算我的知音吗？”我妩媚地笑着问。他诡谲地一笑说：“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回答过了。”我一头雾水地问：“这话怎么讲？”他走到古琴边，轻轻用手指在琴弦上滑过，琴弦发出一阵悦耳的流水声，我顿时恍然大悟，莞尔一笑说：

“文白哥，既然如此，我有个心愿，不知你可否答应？”“什么心愿？”他试探地问。“我们为何不合作一本书呢？我插图，你配文字。”我诚恳地说。“这当然好，这当然好！”他用求之不得的语气说。我如愿以偿地说：“我听嫂子说，你正在创作长篇小说《神话》，不知这是怎样一个故事？”他将我请到笔记本电脑前，颇有成就感地说：“这是我挑战自己想象力的一本书，配插图再好不过了，初稿我已经完成了，正在修改，你看看吧，望多多批评指正。”我饶有兴趣地坐在电脑前，想不到刚瞧了几眼开头，就被吸引住了。</p